



U 本科教学信息简报 第84期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ulletin

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编印

2009年3月27日



◆ 学院之窗

- ◆ 上海海洋大学测绘实习观测网基地建成
- ◆ 2007级海洋技术专业测绘实习顺利结束
- ◆ 2007热能、建筑专业金工实习顺利完成
- ◆ 热情指导学生社团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文学艺术教学部推进素质教育侧记
- ◆ 日本活水女子大学荒木龙太郎教授来校作学术报告

◆ 高教参考：两会代表委员热议：高等教育质量如何提高？

◆ 校长论坛：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学院之窗

上海海洋大学测绘实习观测网基地建设

海洋科学学院 供稿

为满足我校本科生《空间测量与制图》、《测量学》、《地理信息系统》等课程及实习对测绘实践的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我校相关课程的建设,海洋科学学院在临港新校区建设过程中,在新校区办公室、基建处指导下同步规划了用于测绘实习的观测网基地。日前在我校后勤管理处、教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海洋学院海洋信息工程系的老师们与多个部门和单位合作,历时半年终于建成了我校测绘实习观测网基地,并于 2009 年 3 月初在我校首次招收的 2007 级海洋技术专业的《空间测量与制图实习》中启用。



DGPS 测量现场

测绘实习观测网基地建设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勘察地形,选择合适控制点位;二是地点测绘控制点(桩)制造;三是测绘控制点桩埋设;四是控制点的高精度坐标测量。在我校学院楼群周边,经过地形勘察和合理的设计之后,共布设和测量了 31 个控制点。控制点(桩)的制造和埋设分别与 08 年 8 月和 11 月完成。埋设完毕的测量点(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降稳定后,海洋科学学院聘请具有测绘甲级资质的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采用 VRS-RTK 实时动态测量技术,局部地区采取 1+1 的 RTK 测量模式进行,对埋设的控制点进行了四等 DGPS 测量,获得了较高精度的点位坐标(上海市城建坐标和国家 80 坐标)。

高等级的测绘实习观测网基地建设,必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大大改善课程的教学环境和手段,将为我校相关课程的教学实践提供强有力的场地保障。

2007 级海洋技术专业测绘实习顺利结束

海洋科学学院 供稿

海洋科学学院海洋技术 07 专业共 100 名同学，日前利用刚刚建成的测绘实习观测网基地顺利完成了《空间测量与制图》的实习课程。以往由于测绘场地和条件的限制，测绘实习很难开展，只能进行简单的仪器操作练习，而现在随着新校区及专业测绘实习场地的建设，教学实习环境大大改善。

海洋科学学院 供稿
测绘等，内容比较全面，很好的完成了测绘基本内容的练习和工程实践。同学们通过真实的测绘工程实践，不但掌握了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也基本掌握了地形测绘工程的具体内容、步骤、操作、绘图和制图等工作。为后续的课程及今后的实际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本次实习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即经纬仪测角实验、水准仪测高实验、地形测



准备仪器



分组观测



精益求精



收获的喜悦



2007 热能、建筑专业金工实习顺利完成

3月16日起,食品学院07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和07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的全体学生在上海海事大学开始了为期两周的金工实习活动。

金工实习是一门实践基础课,是机械类专业学生学习工程材料及机械制造基础等课程必不可少的先修课,是有关专业教学计划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它对于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有很大的意义,而且可以使我们了解传统的机械制造工艺和现代机械制造技术。

本次实习活动包括车工,铣工,特殊加工,数控车铣,钳工,沙型铸造等,对于我们这些从来没有进行过车间实习的学生来说,金工实习充满着好奇,同学们纷纷表示要珍惜这次难得的实习机会,把

食品学院2007热能、建筑专业学生 供稿
老师分配的工作做好,做到学有所获,劳有所得。要将书本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有机的和实践结合起来,为即将开始的工科课程做好先期准备知识。

由于本次实习活动是在上海海事大学进行,因此,同学们纷纷表现出了海洋大学学生的文明素养,实习结束后主动为操作车间打扫卫生,临走时主动向老师道别致谢,给海事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也有不少同学表示,由于新校区配套建设的不完善导致了我们必须借用兄弟院校的设施进行活动,来回奔波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让同学们稍有抱怨,不少同学呼吁尽早完善我校硬件设施的配套工程,以满足我校将来的学习需求。



热情指导学生社团 积极推进素质教育

——文学艺术教学部推进素质教育侧记

人文学院文学艺术教学部,始终围绕着培养学生人文修养、增进学生人文素质的理念,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把第二课堂活动与学生工作结合起来,多年来成效显著,为我校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

我校整体搬迁到新校区后,为了使学生在新环境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文学艺术教学部老师经常牺牲晚上休息时间,积极指导、热情参与学生活动。08年秋季学期一开学,康明安老师就加入到我校第三届

人文学院 供稿
校园歌手大赛的评委,经过几轮比赛,和团委老师一起,评选出海大歌手的各个奖项。文学艺术教学部王卫华老师积极指导我校“海之韵”书画社活动,为学生举办了中国书法的讲座,还和滕新贤老师一起,为普通话协会举办了“上海市普通话水平计算机辅助测试”的辅导讲座,深受学生好评。

在新学期,文学艺术教学部打算结合“大学语文”课程,帮助学生成立若干读

书会，在课内外大力提倡学生潜心读书，切实提高自身素质。

日本活水女子大学荒木龙太郎教授来校作学术报告

外国语学院 供稿

近日，日本活水女子大学荒木龙太郎教授应邀访问我校，为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师生作了一场题为《长崎和上海—文化的交流与现代日本文化状况》的精彩学术报告。荒木教授介绍了日本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长崎和中国的文化交流状况，还着重讲述了儒教在日本的影响，尤其是孔子的《论语》已经成为日本高中教科书的内容，并且也为日本大众所喜爱。荒木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妙语连珠，赢得在座师生的阵阵掌声。

活水女子大学是日本最古老的女子大学，诞生于 1879 年。这次荒木教授是

首次访问我校，为我校日语专业的师生带来了精彩的讲座，帮助日语专业的师生更加全面地了解日本文化以及中日的文化交流。



高教参考

两会代表委员热议：高等教育质量如何提高？

来源：科学时报

时间：2009-03-11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膨胀，高等教育质量问题也备受社会关注，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从 2003 年开始实行“五年一轮”的高校教学评估制度，但实行几年来，高校和社会对此批评声音强烈，评估工作遭遇尴尬。今年，教育部在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20 个问计于民的关键问题中，

如何改进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也被列入其中。

本期采访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厦门大学教授 郑兰荪院士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梦恕

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



郑永扣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副市长 傅勇林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葛晓音

高教质量存在哪些问题？

担心教学研究传统会中断

郑兰荪：作为教育部化学化工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化学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主任，我一直对教学质量非常关心，现在高等教育质量形势确实比较严峻。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老师都很敬业，教学质量很高。有不少老师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也很深入，有些老师可称得上教育家。

现在我都已经成为老教师了，上一代的老师绝大多数已经退休，现在年轻一代教师素质可能更高，但是随着高校科研的深入开展，科研方面的成果与个人利益休戚相关，所以不少教师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上课是相对次要的工作，甚至有些人根本不愿意去上课，对教学的研究更是严重不足。真正对教学有研究、有造诣的教师越来越少，我甚至有些担心这样的教师今后会“断种”。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化学方面的国际论坛，会议邀请了一些国外的教师参与交流，他们对化学专业教学的研究与实践让我感到震惊，我认为在化学领域，我们的科研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已越来越小，但在教学研究方面的差距却似乎在扩大。如果我们无法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那么肯定会影响到科研的持续进步。

对于厦门大学这样一所有悠久历史

传统的高校，优秀教学传统的传承还比较好，而在那些新建的学校，年轻教师几乎得不到老教师的传承，教学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就更为严峻。

高教质量并非全面下降

郑永扣：高等教育质量是当前全国人民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随着高校扩招，高校在经过快速的发展之后，内涵建设以及质量上的要求势必要提上日程。

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高校针对教育的体制、教育教学的方法，也应该有大的调整 and 变化，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而教育的教学方式、方法有相对稳定性，在这样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确实面临改革发展和提高。因为教育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可能时常变化，这就与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产生一种反差，这是高教质量问题形成的重要缘由。

再有，改革开放 30 年，我们对教育的评价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我们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固有的评价体系也面临着一些变化和调整。

第三，扩招之后，特别是高校实行成本分开，学生要交纳学费之后，学生和家庭要负担一定高等教育成本，学生和家长的付出增加了，对质量的期望值也就高了。

种种方面导致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方面。虽然对高等教育来说，提高质量是永恒的话题，但在目前来看，这是我们突出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高教质量是不是有所下降是一个正



在争论的问题,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学校与学校不同。在同一学校内,院系专业之间也不同,不能笼统地说高教质量下降了,这样的评价有些偏颇,但在一些高校和一些专业,确实存在着高教质量下降的问题,比如一些发展较慢的公立院校和一些民办院校,确实起点较低。

即使是一些老校、名校,不同的专业情况也有不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专业调整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很多以前没有的新专业学科也要高质量,即使是一些基础性的、老的学科,也有一个在原有基础上更新教育教​​育的内容、方法等问题。

质量问题根源何在?

傅勇林:我在高校工作了20多年,除了教学也从事管理工作。如果站在一定高度来审视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不足,我认为,最深层次的问题可以归结为3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近代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后,由于新学的兴起而产生的一个舶来品。因此,对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大学传统,我们未必有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大学,归根结底是由几个关键词所构成——科学、理性、知识、智慧、人才。对理性精神认识不足,导致无法管理大学,无法把大学真正办好。而对理性精神的认识不足,正是现在我国大学的通病,也是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

所谓理性精神,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即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目前我国大学在管理上过分强调“万物”,资源配置、政策的

制定、人才培养等方面在枝枝蔓蔓上花的力气太大,这与理性精神是相违背的。理性精神要求透过“万物”看到“道”,道者理也,据理而治校。

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缺失,导致了我国大学的第二个问题,即制度化不够成熟。制度是科学精神的外在体现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结晶,更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制度化不够成熟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现在很多本来特色鲜明、专业优势明显的 college (学院) 盲目地要转型为 university (大学),这实际上满足了某些人对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欲望,但却没有按照科学精神以及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办学,大大地浪费了资源。

第三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学的组织化程度不够,体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大学对教师的管理很松散;大学和其下各学院的关系也很松散;学者或教师之间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科学共同体。这三点对大学的发展是致命的。

由于大学对教师的管理是松散的,现在很多教师除了上课时间外,基本不在学校。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才的引进流失和国有资产的流失。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教学质量、科研水平以及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

郑永扣:从体制的框架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这是基本的架构,这中间,我感觉突出要解决三方面问题。

第一,高校要有办学自主权,这不是要高校脱离政府的领导,而是高等学校作

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在办学方面要有相当的自主权,尽管公立学校是政府办学,但是政府办学体制下,高等学校也应该有办学自主权,现在的办学自主权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高校在国家宏观计划的指导下,要拥有招生、人员聘任、学术研究等的自主权,大学又有独立的章程,按照章程运作。

第二,高校自身要解决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的关系,大学是个学术机构,必须以学术为本位,而不是以行政权力为本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理想的平衡状态,应该是定位准确、边界清晰、相互制衡、良性互动,形成这样的良性关系。而目前在高校,行政权力过强,遮蔽了学术权利,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取代了学术权利。在高校中,党务和行政管理的权利应该在党委和行政机构,但是学术权力一定要回归学术,明确一点,就是教授拥有对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对学术研究的主导权、对党政管理工作的建议权,如果做不到这些,很难办成优秀的大学。

第三,高校在内部也应该使院系拥有作为办学实体所应拥有的人权、财权、物权,目前大学内部统得过死,权力过分集中,而科研、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职能又是靠各个院系来具体实现的,可是在这个层次上,各个院系对于人、财、物的支配权先是很小的,这一权力都集中在学校的层面上,这也导致了院系层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足,影响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如何看待各类评估?

各类评估代价巨大

王梦恕:近年来教育部对高等教育

进行指标化管理,对大学进行分级,推行各种评估、评比活动,完全没有必要。近年来,教育部推行的各类分级和评估,引起了高校甚至社会的强烈反感,改革开放30年来,无论哪个领域,我们的高校都没有培养出真正的大师,教育部的高教质量管理导向要负很大的责任。

首先,在学校发展的层面,高校应该是各有特点各有优势,但是教育部把各大学分成“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普通高校三六九等,重点高校大力投资,而那些普通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很多都在基层工作,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反而得不到扶持,这是不公平的。

高校之间的评估和排名,促使高校到上面来跑关系,搞“运作”,造成了高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去年某高校6位校领导迎接教育部一位借调科员的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从高校的领导到普通教授,工作的重点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去搞公关、拿项目,这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损害是很明显的,而且也很容易造成相关人员的腐败。

毕业生是衡量高教质量的重要标准,一个高校只要踏踏实实的工作,认真培养人才,毕业生有很好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到社会上能很好的工作,受到市场的欢迎,它就是一所好的大学。

不管是高校还是教育部,都应该对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负责,不管学校的规模多大、师资多强、是不是重点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那教育质量就值得怀疑。而且,现在越是重点大学的教育,就越是脱离实际。

此外,教育部对高校办学的评价标准

统一化，鼓励高校都向大规模、综合性高校发展，不少高校淡化了原有的办学特色。以前各部委办大学是正确的，毕业生专业对口、动手能力强，到单位马上就能上手工作。目前原有部属高校或归地方管理、或归教育部管理，单一的发展模式造成教学越来越脱离市场需求。

其次，现在的高教质量管理的导向错误，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结果。现在评价教师，重点不是他的课受不受学生欢迎、教学的水平的高低，而是写论文的本事。造成了论文造假现象非常严重，教师为了评职称不惜东拼西凑地抄袭论文，最近浙江大学论文造假事件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以论文和科研成果数量评价教师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科研越来越成为个体的研究，教师成为科研个体户，各自为政、自私自利、拒绝团队合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如此。

葛晓音：高教界对于目前教育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连年都有强烈的反映，但是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

这几年，我国高校的规模逐渐扩大，教职人员不断增多，在不能保证每位教职人员都自觉自律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教学和研究质量，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认为，适度的管理是必要的，关键要把握好度。

评估的原初动机是促进教育，但现在适得其反。各种名目的评估检查令基层教员应接不暇，尤其一些优秀的大学，对于评估检查早已麻木，于是就用一堆数字敷衍了事。可见，这种评估管理不但体现不了奖勤罚懒的评估效应，反而导致学术泡沫越来越多，而且教师们在厌倦之后产生了抵触心理，每次评估只是胡乱应付，对于管理层的意见也越来越大。

目前所确立的牢不可破的评价体系，固然催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但也同时制造了许多学术泡沫，更可悲的是一些“名家”学者抄袭剽窃的丑闻不断曝光。可见，管理上的度，既不能太疏，也不能太密。

成绩大于失误

傅勇林：对于教学评估，我认为要辩证地看，有积极意义，坏处与好处可以说是三七开。

教学评估的三级指标体系，是许多人根据国内外经验和中国的现实情况设置的，凝聚了众人的智慧以及办学管理经验，同时也代表了某种意义上的办学方向和管理制度的要求。而且，它代表了国家方向，各个高校都需要按照三级指标体系去建设。

如果拿着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的时候，发现自身的很多问题，只能说明学校的办学本来就很差。如果不评估，差的情况就会一直维持下去，大学将误人子弟，更严重地说，将毁掉民族的前途。用指标考核，就是为了让学校达到要求，改正不足，做到更好。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学到一些先进的办学经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国家的办学方针和教育导向。

学校按指标改正，就是亡羊补牢，而并非所谓的“作假”。有的人认为教学评估是一种作假的行为，只能说明那些人



普遍的倦怠感、不成熟、不负责任，没有把学生和民族的前途放在心上。归根结底，这种想法是从个人和部门利益来考虑问题的。

教学评估的制度设计上很好，但是机制上有一些问题。比如评估专家组人员的遴选，甚至现在有的所谓专家已经把评估当做了一种职业。

评估何去何从？

全面取消

王梦恕：如果要彻底解决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我建议取消教育部针对高校的各类评估和评审、取消学校的排名和分类，教育部只进行一般的管理和监督，让高校真正依照《高等教育法》，实现自主办学。

改为专业评估

郑永扣：教学评估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通例。评估是必需的，评估本身对高校建设也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因此，在方向上我们应该加以肯定，但具体的方式方法却有待改进。

目前我国实行的评估机制，实际上是对学校工作的全面评估。我认为现行评估的内容要简化，要抓住最核心的内容，在程序上也应该简化，同时加强对学校各个专业的评估。

相比较起全面评估，专业评估要更为有效、客观、准确，因为不同学校里面的不同专业情况不同，比如在一些被评为优秀的大学里面，可能存在并不怎么优秀的专业，有些学校可能不算优秀，但不排除某一个专业很突出，所以应该由全面评估过渡到专业的评估。

郑兰荪：推动本科教学评估，提高

教学质量，应该以专业评估为主，并改进评估的方式方法。

更新理念 与国际接轨

葛晓音：我觉得各级管理部门应当学学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这篇文章中，有些种树的人“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柳宗元以此道“移之官理”，“得养人术”；我以为此道也可以移之于学术管理，得养学者术。

学术的“道”就是潜心钻研，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心浮气躁。对于被管理的学术研究者来说，要出大成果，必须给予时间，“不害其长”，“不抑耗其实”，才能“蕃吾生而安吾性”。否则，学科建设的前景实在是令人担忧。

评估的理念陈旧，目前所有的评估都是针对科研和教学环节，只注意学生教师知识的积累，忽略了全面教育。只看纸面上的文字材料，不看各高校在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地位影响，更不看各高校毕业生走上社会的实际表现。

这方面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香港的大学平均五到六年，由校方的评估小组对各院系进行直接评估，他们一方面跟院系的教员、学生座谈，另一方面跟学生毕业后工作单位的雇主座谈，从而对教学效果、教师以及培养出来的学生进行综合评估。

在更新理念的前提下，应当重新确立简明可行而又与国际接轨的评估标准。简化各种项目的申报，减少各种评估的密度，在方式方法上并不一定要全部量化、

细化。

对不同大学要根据实际地位和业绩分出层次,评估也应分出层次等级,不应应用同一套标准和模式。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死板的评估指标和“一刀切”的管理标准,值得商榷。

正是由于目前评估标准“一刀切”,致使国内所有大学都向着研究型大学发展。尽管很多高校并不具备很好的条件,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学术泡沫大量涌现。教师的精力是有限的,在研究上花费的精力多,自然对教学就不太重视了。

针对这种情况,应该区分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两类高校。对前者的考核评估应该偏重于研究工作,而对后者的考核则应偏重于教学任务。管理层要根据教学和研究两方面的不同侧重,制定出合理的考核标准,然后才能要求教师合理地分配精力。

提高高教质量的突破口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郑兰荪: 要想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高校教师的培训是关键,教师队伍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现在各专业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正在制定教学规范,规定哪些内容必须要教,哪些教学条件一定要达到。

应当把教授、把一流教师推到教学第一线上开设本科课程,我一直在为厦门大学化学系的大一新生上普通化学的课程,已经坚持了十几年。

应该鼓励年轻教师以科研为主,年纪大一点的教师以教学为主。这和两种工作

的特点有关,科研需要创新能力、需要年轻人的冲劲,而教学则更需要老教师的知识积累和教学经验。

王梦恕: 对于师资队伍建设,我的建议是,首先是要彻底改变评价教师的标准,不能以论文和科研成果作为主要标准。最近我在中国工程院参与了一些评审,只要求申请人提交自认水平较高的10篇论文,以此评价申请人的科研水平,对论文数量一概不要求,一位申请人在5年之内居然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出版了10部专业著作,最后的结果一样是被淘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扭转科研工作中不切实际甚至造假的追求论文数量。

评价教师我主张论资排辈,在教学、科研岗位工作满一定年份,就可以参评上一级的职称,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高校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促进团队合作。

加强高校内涵建设

郑永扣: 要解决这一问题,从高校自身来说,需要从各方面努力,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

首先是学科建设,没有高质量的学科,不可能有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其次师资队伍建设,没有高水平的师资,也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教学;再有就是充足的教育资源,主要指校舍,设备和其他后勤保障,有些高校扩张得很快,导致一些基本的资源得不到保证,也会影响教育质量。

在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上,学校当然责无旁贷,提高教学质量是我们不断努力的基本目标,同时国家也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需要作很多努力,其中基本的一条就是投入,投入上



不去不行。

在投入方面,首先是资金投入,但从更高层面上看,还要有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进程,因为我们目前是在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来办高等教育的,所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体制机制的核心问题。

加强高校内部管理

傅勇林: 要想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必须加强学校的内部管理。学校的办学方针最终要落到院系实施。一方面,各院系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学校的战略方针,通过战术推进的方式,使战略意图得以实

现;另一方面,各院系之间也需要“协同作战”。每一个院系既是一个行政体系,又是一个科学体系,还是一个人才培养体系,但是在松散的管理体系下,形成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无法行成有机的系统,也无法培养出具有大学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

如果学者与学者之间是松散的,没有形成科学共同体,那么就不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创新与突破,更无法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型人才。

校长论坛

[编者按]:

中国大学改革的二维坐标,在横的方向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极大地满足广大人民的学习需求;在纵的方向,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这样一场整体性的演进中,大学教育的方方面面都被提到改革和创新的议事日程详加考量。近期的“名校换校长”之所以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正是因为高校治理离不开校长等主要领导者的理念与智慧。我校在更名和搬迁之后,着力优

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编制 2008-2020 年发展定位规划。各学科专业如何围绕学校的发展定位规划未来发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形势,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使得自身得以可持续的发展,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在此本报设立《校长论坛》专栏,刊载中国名校校长之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在全校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 大学和学者都应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

杨玉良

杨玉良，1952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男，汉族，教授，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复旦大学校长。

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并留校工作。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并荣获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奖。1986年，留学联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成为国际著名学者 Spiess 教授核磁共振技术研究的博士后。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教授。1999年成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第一批特聘教授。200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连续两次任国家“973”计划首席专家，2008年度又被聘为国家“863”计划首席专家。1993年以后，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1月任现职。

杨玉良院士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学博士，在高分子化学和物理等多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体现在：研究具有



复杂拓扑链结构的高分子链构象统计与粘弹性；建立了研究高分子固体结构、取向和分子间运动相关性的三项新的磁共振实验方法；运用自洽场及相分离动力学理论研究了复杂链拓扑结构的嵌段高分子、液晶及囊泡等软物质的斑图生成及其临界动力学领域的诸多悬而未决的

问题；发展了高分子薄膜拉伸流动的稳定性理论，并由此指导和解决了双轴拉伸聚丙烯(BOPP)薄膜生产中长期困扰产量和质量的破膜问题，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创立了模拟聚合反应产物的分子量分布及其动力学的 Monte Carlo 方法，收集在专著《高分子科学中的 Monte Carlo 方法》中，深受国内学术界欢迎，对我国高分子物理理论研究的开拓和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迄今已发表科研论文 200 余篇，论文被他人引用 1150 余篇次，申请多项国际国内发明专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 10 余项和“求是杰出科学家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多种荣誉。他培养的博士生中有三位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



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

——在全校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玉良

2009年2月24日

各位老师，同志们：

今天是本学期第一次党政干部大会，也是我到任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原本今天是要我向大家布置2009年度的行政工作要点，但《工作要点》已经下发给各单位，我没有必要在这里拿腔拿调地念一遍，或是作一些“强调”和“解释”。我总觉得这样讲或多或少有一点“官气”，令人生厌。我相信大家回去后会认真阅读，具体落实。因此，我昨晚突然决定要换一种方式，一来不想使大家觉得“又是老一套”，二来想在这里说一点我自己想说的话。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预先申明：下面的讲话没有受班子的委托。这或许有点自由主义，但是我保证我下面要说的是真话。

掐指算来，我到任才刚进入第六周，要说一些所谓的“施政纲领”那是无稽之谈。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了学校的一些教授（主要是人文社科的教授），听听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想法。我深怕职能部处给我留下一些先入为主的意见，因此在座的职能部处的干部我大多还没找。在与教授们的交谈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一些感受，谈出来求教各位。

最近我随时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复旦来当校长，你准备好了吗？答案只能是“没有”。但是有人会说，你连准备都

没有那你来干嘛！我说我在作一些调研，有人说我这是托词，也该谈点什么了！总而言之，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咱们就像北大“兼容并包”那样，也把我兼容一下，尽管我是校长。

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他的知识结构极其重要。有些专著上说，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通才。然而，专才容易，通才难得。所以，我的压力大家可以理解。从我的背景来看，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化学家，再具体一点就是高分子化学家，所以这点知识是非常有限的。其次，像我这样的科学家有一个习惯，说它好也好，说它不好也好，就是比较喜欢用逻辑的办法来看问题，但是现实告诉我这个世界又不全是逻辑。所以我在稿子的页边上写了一句话：“避免完全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或者说来看这所学校。”但是要改变这个思维方式确实很难，说实话我也只能力图改变。

在座各位都知道，复旦大学从陈望道校长离任以来，已经有32年都是理科的人来当校长。我们不去分析为什么老是由理科的人任校长。北大的陈平原教授有过一句话：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都要用院士，但是人文及社会科学没有评院士。但是我在回复任校长前，北大有一位退下

来的副校长跟我讲,复旦大学是一所有非常深厚的人文社科底蕴的大学,你这个校长当得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人文社科的教授对你的接受、认可程度。说句实话,我听了以后出了一身冷汗,因为人文社科不是我的长处。我一想也有道理,人文社科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关键学科,因为它关乎人的精神。而且,教育学就属于哲学的范畴。我经常自嘲,别人有时也这么评价,我只是有点知识,但是没有文化,也不懂管理,主要只有自己专业领域的知识。所以,让我扛着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头,这个压力是可以想象的。要想没有压力,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对这所学校干脆就不负责任,但这显然不是我的选择。

所以,对我来讲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向实践学习,向大家学习,向教授们学习,向书本学习。我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力图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这所学校,而不是完全用科学家非常逻辑的眼光。换言之,我们能否不只是简单看一个学校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导、多少SCI文章、文章引用率多少、得奖数多少……,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不能把这些所谓的“指标”先撇开,然后再看看这个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学校。

看一所学校,尤其对于一所名牌大学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历史感。要看出复旦是一所活生生的、有文化底蕴的复旦,这是我所期望的。所以昨晚我起草这个发言提纲的时候,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

在国务院学位办工作的这些年,我走了很多学校,但是我感觉在大学文化的坚守上,或者说是精神和使命的坚守上普遍有所缺失。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所以有一些荒唐事情就会出来。我最近在读余英时的《知识人与中国文化的价值》,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文化的价值虽然起源于一个民族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中,但必须经过系统的整理、提炼、阐明,然后才能形成一套基本的规范,反过来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当中发生了引导作用。这一整理、提炼、阐明的重大任务,就中国传统而言,一直是由‘士’承担着的。”如果按这个定义的话,一个民族的文化尚且如此,那么现在知识分子集中在大学里,大学的文化当然是由我们在座的、不在座的和已经毕业的所有成员来共同塑造、整理、提升的。

春节团拜会时,我曾经引用过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先生在离任时的演讲。他说:“什么是大学的文化,她就承载于一些名师们的传说和轶事当中。”所以我想,一所好的大学必须有让学生感到自豪的“名师文化”。那天我也发了感慨,我觉得我们复旦大学的教师在写有关各学科名师的一些追忆类的文章比较少。但我相信,当学生们在传诵这些名师们的传奇故事的时候,就会透射出那种让人感动、激越、开怀并且已经升华了的大学文化,这种文化是靠学校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校友们共同传诵的。它对每一个学生起着潜在的精神引导作用,其效果往往超过刻板的、一本正经的“大事记”或者“校



史”。

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最容易被传诵的名师大多是人文社科的教授，有人总结认为是因为文科的教师和学生比较善于舞文弄墨，写他们的同事和老师，而理工和医科稍欠缺些。正因为这样，我觉得人文社科的教授们的学问、才气、情怀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以及他们流传下来经过“歪曲”和“添油加醋”的故事，对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续是极其重要的。在传播这些老师的故事时，叙事者的“歪曲”和“添油加醋”恰恰是反映了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试想，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崇敬的心情，如果老师对学生没有关爱的话，如果学者和学者之间没有一种相互敬重、相互欣赏，那么这样的文章和故事就会少。所以这些传诵实际上是反映了这所学校的学术和文化环境，叙事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比如说我们在读李登辉、陈望道等老校长的传记的时候，判断这份传记写得好不好的标准就是作者是否倾注了全部的情感。

名师们的故事传诵过程，套用余英时先生的话就是一个提炼、整理的过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套学校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规范，并在大学师生的精神生活中发生引导作用。正因如此，我才会说，人文社科的学者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在复旦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是颓废的，还是积极向上的，无论是相互合作的，还是互相攻讦的，呆板的还是幽默的等等，都将改变或者延续学校的文化。我这里不是说其他门类，如医科和理科，就不会传诵精神与文

化，但人文社科确实有其特别重要的功用。

既然如此，令我有点伤感的是现今复旦大学有些院系及其名师的故事还能否有人继续传诵？一些学生和年轻教师对本系的发展史、本学科的发展史及其历史上的名师的故事知道多少？……大家要千万注意这一点，这实际上是我们学校发展的文化命脉。我们可以让一个本科生去参观校史馆从而能记住一些事件的时间节点，但是那些都不是活生生的内容。几十年前和当前的名师故事没有人传诵，无人整理，都没有留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今天这里在座有很多院长系主任都应该明白，这个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因为这关乎复旦精神的发扬和传承。我曾经说过，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大学，如果把这方面工作做的很好的话，那么这所大学的每一面墙壁、每一草一木都将散发着育人的气息，年轻学子人人都会梦想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一旦进入其中，一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且由此激发出对人类、对社会、对国家、对学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所大学也就成为了曾经在其中生活、学习过的每一个校友的终身的精神家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校庆时很多老校友走路都很困难了，还坐着轮椅或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母校看看。校庆时如果对返校校友的年龄作一个统计，哪个年龄段的校友来的最多，那他们大学时必定是“文化精神”的佳期。反之，复旦大学则成为他们的“伤心之地”，而不愿回首，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只有具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学校，借其巨大的文化力

量，才能使校外的英才宁到此来做“凤尾”，期盼着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从来不相信物质的东西能主导一切，因为优秀的学者是有自己的追求的。所以这方面的建设虽然说是软的，但是实际上比我们多一篇所谓的 SCI 文章、甚至是所谓 Nature、Science 的文章重要的多。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低 Nature、Science 的意思，而只是说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一种东西。

那么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究竟应该向后辈传递一种什么东西？首先，我觉得大学天生是一面永远高扬的道德旗帜，其中的优秀成员必须是道德的楷模。人们对于大学的神圣和道德的纯洁性有着很高的企盼和信任，希望大学成为社会的净土。因此，当一所大学出任何丑闻，人们都会非常关注。所以，大学不仅需要“学问”，更需要“道德”和“精神”。这些年大学的道德和精神是有点缺失，有些学者身上出了不少怪事。一个道德败坏的学者是一所大学的污点，这一点毫无疑问。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讽刺过那些学术做得不错但道德水准不高的学者为“才子+流氓”。这样的人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想复旦大学不需要这样的人。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有一句话，有些教授做了官以后，就是“帝王气+流氓”，帝王气就是唯我独尊，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们大家都需要警惕这一点。当然，如果我身上有这种坏毛病，希望在座各位能及时向我指出来。而且，每一个教授的道德操守将影响我们对学生的教育。美国教育家德怀特·艾伦说过，“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性的话，那

么我们就在为社会创造危害。”那么，如果教授本身成为危害的话，那我们就创造了危害中的危害！

第二，我觉得大学的学者应该崇尚学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的需要时，才算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每一个学者，包括我自己，我们都要拷问一下自己，我们在做科研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出于自身内在的需求。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也说过，“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当中获得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我们也可以问，你在做科研、做学术的时候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我完全赞成真正的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尤其在现今，学术和市场结合越来越紧密，不恰当的政策将使学术研究沦为一种完全的商业行为，其一方面有利于学术的普及和成果转化（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并反过来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新的推动力，但是我们必须警惕学术研究出现完全商业化的倾向。因为这种倾向会下意识地使得我们在“考评”一个学者时候容易采用“计件取酬”的方法。有一位院士跟我说，现在我们似乎都是采用“大寨式”的评工分。你发一篇文章多少分，……，最后加起来就得到一种“定量”评价。事实上，这是一种学术研究和评价手段的本末倒置。我并不是完全否认这些定量的数据，关键在于对定量数据怎么看，赋予了多少它不应该有的内容，比如说跟学者的地位、收入等过分紧密地联系起来等，那就有问题了，其必定会产生大量的“学术泡沫”、“伪学术”，甚至“恶学术”。



如果这种倒置成为一种制度，即，一套非常严密的等级式的量化标准和繁琐而不切实际的“操作程序”，虽然现阶段还很难避免，但从长远来看，将是十分糟糕的，它是一种“学术科举制度”，其促使少数人在这种体制下成为没有学问的“学霸”。

因此，努力追求将自己的研究与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但同时坚守“学术为本”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换言之，通常情况下，扎实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服务”。我想对任何学科都是如此，毫无例外。在此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各级干部和院长系主任包括教师，一定不要为了蝇头小利，为了多发几个奖金，而忘却了对“学术为本”的坚守。试想，大学里如果任何一个学科若不坚守“学术为本”，那么十年后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到时还能满足“服务社会”的期待吗？对此我们必须非常清醒。现今谈坚守“学术为本”相当于保持“热闹中的寂寞”，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贵的。

第三，大学学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在用“学术”或“知识”换金钱，换官位，骗色，……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更需要额外提醒。**我们教授在课堂上和社会上发表某种言论时，需要肩负一种社会责任感，不能引起社会的思想混乱。**我们通常讲有**两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一条是政治底线。**当然，在校内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是你在课堂上讲课或者在发表文章时候，你要守住这两条

底线。这个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重视的。

听我前面说的这些话，大家马上就可以感觉到，杨玉良是个理想主义者。我想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们大家再想想，复旦的学者包括学生，跟其他的学校比起来，是不是就多那么点“理想主义”呢？这是我们的长处。令人有些沮丧的是，现在“理想主义”这个词好像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代名词。“理想主义”不能遭到如此贬义的理解。从哲学上来讲，理想主义带有彼岸性，你可以尽可能地逼近这个“彼岸”，但是你永远到达不了“彼岸”。她“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理想主义是“彼岸”的一座灯塔，如果没有她，就无法照亮“此岸”。关于大学的理想主义告诉了我们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只有她的存在，我们才能做到坚守“学术为本”，坚守“服务社会”，坚守“服务国家”，坚守我们的道德，这是我们的使命，这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复旦”。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继承和弘扬复旦历史上的优秀传统和精神。就像在我的就职演说中讲过，我希望我们有一种崇尚道德、崇尚文化、崇尚学术的精神与文化，坚守使命，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那么复旦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丽！

来源：复旦新闻网：

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s/news_content.php?channel=1&id=20683

大学和学者都应坚守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玉良

2009年03月15日 来源：新华网

自从古老的欧洲大学建立以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从贵族的"门客"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并逐渐转变成为"职业化"的研究人员。当历史进程跨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时,学术研究成为国家行为,体现了更强的国家意志。进入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术研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介入使得学术研究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得到了空前的发掘。这种深刻的变化反映了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发展之必需。然而,谋取学术研究的经济社会利益也就随之成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追求的目标之一,从而伴生出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

虽说"学术失范"行为不足为奇,但学术研究的职业化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个人的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构成了对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尤其是其中个人与学术机构在利益上的捆绑过于紧密时,学术机构也将揭露遮蔽"学术失范"的丑闻,因为问题的关联方都意识到此类新闻的媒体效应具有很大的杀伤力。这种"杀伤力"来自公众对"学术研究"、学术机构和学者的"神圣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期盼。遥想

源于17世纪中叶关于牛顿和莱布尼茨关于微积分的发现权(以及是否存在剽窃)的争端,英国皇家学会乃至皇室也被卷入这场纷争之中,至今仍未完全平息。进入现代,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学术失范"案的争端也常常演变成国家之争,成为外交事件,政府首脑们也不得不为之亲自出动。

反观当今国内的"学术失范"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似乎还另有原因。首先当然是学者对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认知不足,忘却了"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适性价值理想。除此之外,媒体本身对"学术研究"的报道也为其罩上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光环",使"学术研究"带上了人为的"神秘感",而缺少应有学术精神和严谨性。媒体的这种"广告式"的学术报道,往往连研究领域稍有不同专家都难以理解,并常常对公众产生误导,但它却为学术机构和个人赢得一些实际的利益。这种做法的一个"隐动力"源自多年来风行的,严重背离学术精神的学术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其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更具娱乐色彩的是,一些大学自己的"高等教育研究所"也热衷于向媒体发布"大学排行榜"之类的新闻,甚至还煞有介事地"定量"计算出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

颇具娱乐性的闹剧常常是我们大学自编、自导、自演并得到大学当局和教师的主动、半主动的配合的。当这种闹剧在相应的制度保证下被导演出来,它就有一整套繁琐的评价指标、严密的操作程序、定量的计算方法、……。这种颇像文革时期农村中的"大寨式评分"的考核与评估办法,或许对于"治懒"有一定的作用,但这种貌似精确的手段遏制了学术研究的灵魂,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乃至大量的"恶学术"。在这种不符合科学精神的评估及评价体系下,大学颇有可能沦为"大学排行榜"里的大学,"一流大学"成为"指标化"和"数字里"的"一流大学"。虽然,这样那样的"排行榜"的发布有时颇具热闹的"新闻效应",但我们必须牢记,大学要"仰望星空",要思考未来,更需要冷静与宁静。因此,在此类问题上,我们大学及其中的学者不应追逐此种"媒体效应"。

令人担忧的是,与这种"大学排行榜"产生相对应的评价、评估方法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演变成为一种"学术科举制度"。这种"制度"还将"学术成就"与各种实在利益"定量地"、过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不仅使得"学术道德"和"学术精神"的消解,创造力的贫乏,而且还催生了诸多没有真正学问的"学霸"和"官僚化的学者"。因此,废除那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和学

术传统的学术评估和评价制度,或许可以对净化"学术空气"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复旦大学正在着力开展这项工作。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诸多大学为了抬高自身的学术声誉,也为在一些评估的"数字"里有更好的表现,聘用了一些"学术大腕"来为之撑撑"门面"。有时这种"门面"还确实能为聘用单位谋得一些实际利益,但此举却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国家资源的配置。一些受聘者也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不顾自己的时间与精力而多处兼职。这种"不良兼职"现象的发生或多或少也是受到了评价、评估和评审体系的影响,到头来往往往给受聘者和聘用单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化了"学术空气"。因此,杜绝那些有名无实、徒有其表的"双聘"和"兼聘",或许对遏制"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总之,作为学术机构和其中的学者,对学术、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坚守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在"坚守"的基础上改革不良的学术制度,消除在学术、个人和学术机构在世俗利益链条上的附加的"增强链",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避免各类"学术失范"行为的发生。因此,所有的学术机构、学术管理机构、学者,包括媒体,都应为此努力。

